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11, 1928–1934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8.01928

·研究简报(Research Reports)·

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与个体主义：来自多种文化任务分析的证据*

骆 诚[1,2] 任孝鹏[1]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49)

摘 要 自愿移居假说认为自愿拓疆运动能够促进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从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地区(深圳)和对照地区(襄樊)两地抽取 583 名大学生，将是否本地人作为干扰变量进行控制，采用自我建构量表、集体主义量表、图片分类任务、归因任务、“亲亲性”任务等独立我/互依我测量指标，考察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与个体主义的关系。结果显示，在控制是否本地人后，深圳样本比襄樊样本报告了更高的个体主义指数得分和更低的集体主义量表得分，更低的整体思维，对朋友诚实更低的奖励，对朋友欺骗更高的惩罚。结果表明，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已经形成了与对照地区相比更偏向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自愿移居假说也适用于源文化是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

关键词 自愿拓疆运动；个体主义；文化任务；深圳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自愿拓疆运动(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能够促进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Kitayama, Ishii, Imada, Takemura, & Ramaswamy, 2006; Kitayama, Varnum, & Sevincer, 2014)。它可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个体主义的差异，比如 Kitayama 等人分别比较了美国、英国和德国在框架直线任务(Framed line task)、自我膨胀任务(Symbolic self-inflation)、内隐社会取向任务(Implicit social orientation questionnaire)、归因任务(Attribution task)四个文化任务上的行为表现，结果发现美国人比英国人和德国人更倾向于素质归因，自我膨胀程度更高，对情境的关注度更低，体验到更多的社会分离情绪和更少的社会卷入情绪，而且这两类情绪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上，美国人社会分离情绪对幸福感的贡献更大，这些都表明了美国人在归因、知觉和动机以及自我肯定方面都表现出比英国人和德国人更强的独立我倾向(Kitayama, Park, Sevincer, Karasawa, & Uskul, 2009)，但是外显测量报告的 Singelis 自我构建量表(Singelis self-construal scale)结果与内隐文化任务报告的结果并不一致；Varnum 曾经比较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四个移民国家以及英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最常见孩子名字在人群中的百分比的差异，结果发现移民国家最常见孩子名字在人群中的百分比要低于欧洲国家，而且这些差异可以用 Hofstede 的各个国家的个体主义分数进行解释，说明移民国家的人们在给孩子起名字时，更愿意给孩子起与众不同的名字，从而导致了最常见名字占人群的百分比低的现象(Varnum, & Kitayama, 2011)。它也可以解释同一国家或文化内不同州或县之间的差异，如 Varnum 等用最常见名字占人群的百分比作为个体主义的指标，发现在美国内部，越晚加入美国的州，其个体主义越高，反映了越晚加入美国的州的人越偏好与众不同(Varnum,

收稿日期：2018-04-29
* 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 计划) (KFJ-EW-STS-088)；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应急项目“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心理地图” (Y4CX157009)；中共北京市社工委项目“北京居民社会卷入和分离情绪调查研究”。
通信作者：任孝鹏 E-mail: renxp@psych.ac.cn

& Kitayama, 2011); Kitayama 等采用内隐社会取向任务、认知失调的合理化任务和归因任务三个文化任务, 将被试分成美国人、出生和居住地都在北海道的日本人、出生在日本本岛但是现居住在北海道的日本人、出生和居住在日本本岛的日本人四组, 结果发现出生和居住地都在北海道的日本人在上面三个任务的表现都更像美国人那样表现出独立我的文化特征, 而不同于日本本岛的日本人表现出互依我的文化特征(Kitayama et al., 2006)。

自愿拓疆运动主要通过以下机制来促进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Kitayama et al., 2006; 陈姗姗, 徐江, 任孝鹏, 2016)：(1)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拓荒者(frontier settler)自愿移居边疆的主要动力是追逐个人财富和自由, 他们为此做出了大量的个人投入和牺牲, 因而拓荒者们具有高度自主、独立和目标导向的心理特征, 倾向于新异寻求和冒险; (2)强化(reinforcement)或适应(adaption)：拓荒者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艰苦, 不具备独立的目标追求、自我导向与自力更生品质的拓荒者将无法生存下去, 即拓荒环境强化了拓荒者的独立我特征; (3)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一大群目标取向的人聚集在一起, 必然迅速形成与独立我特征相适应的制度化的规范和信念, 并通过这些制度化的规范和信念传递给其他人和下一代。一些研究探讨了这三个机制, 特别是自我选择和适应机制, 结果发现, 在自愿移居的过程中的确存在自我选择、适应和制度化机制(Kitayama et al., 2006; Sevincer, Kitayama, & Varnum, 2015)。

自愿拓疆运动假说的不足之处在于都是用自愿拓疆者的后裔来推测其祖先,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已经很难找到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边疆地区供人类开发, 所以找不到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 利用拓疆者来检验这些机制(Kitayama et al., 2014)。但是中国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可以自由流动, 提供了一个符合自愿拓疆运动假说的地区——深圳(Feng, Ren, & Ma, 2017; 陈姗姗等, 2016)。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现在已经成为和北京、上海、广州一起的一线大都市, 但是深圳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口)以及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传统一线城市都不同, 他是个由外地移民组成的城市, 而且这些移民也与历史上的中国的移民不同, 是自己主动选择来到的深圳。深圳在形成过程中符合自愿拓疆运动的所有特征：(1)移民的自我选择; (2)深圳是中国的边疆地区, 而且在早期, 深圳特区与其它地区之间还有人为设立的屏障, 使得其边疆的意味更浓; (3)虽然深圳不存在自然环境的艰苦, 但是所有深圳移民远离自己的家乡和熟人网络, 也使得他们必须靠自己去解决遇到的大多数问题, 其社会环境相比于家乡是艰苦的; (4)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 引领着中国的改革方向, 很多政策都是在深圳进行尝试以后才推向全国的; (5)深圳也开始形成自己的地区认同(何梅念, 郭田友, 2008), 并在很多方面都与周边地区不同, 比如深圳人说普通话, 而周边地区说方言(Feng et al., 2017)。

有研究表明, 深圳地区确实比其它地区的个体主义更高, 如深圳人在自我膨胀任务上比佛山人的自我膨胀程度更高, 在框架直线任务上比佛山人在绝对任务上误差要低, 在相对任务上误差要高, 表明深圳人在观察物体时对焦点目标更关注(陈姗姗等, 2016)。深圳人比武汉人自我报告的独立我要高, 而互依我没有差异, 知觉到的关系流动性更高, 在“亲亲性”任务(Loyalty/nepotism task)上对陌生人更多采用奖励的方式, 而朋友和陌生人的差异更小, 也就是说比武汉人的内群体偏好更低(Feng et al., 2017); 比荆州和巴中地区更喜欢用独特的名字给孩子命名(陈欣欣, 任孝鹏, 张胸宽, 2018)。这些证据表明即使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也能促进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

不过, 在深圳的个体主义高的研究中, 有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很好地控制本地人和外地人。虽然 Feng 等(2017)认为所有的深圳人都是移民, 最多是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的区别而已, 并且控制了关系流动性以后, 深圳人仍然比武汉人的个体主义更高, 但是中国的客观情况是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的外地移民, 差异只是外地移民的比例高低不同。再者, Oishi, Lun 和 Sherman (2007)的研究表明认为, 对于高居所流动性(Residential mobility)的个体来说, 独立我更加重要, 而对于低居所流动性的个体来说, 互依我更加重要; Oishi 等(2007)的研究也表明, 低居所流动性会促进集体主义行为的发生。因此, 如果能够严格控制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混淆, 深圳的个体主义高的结果会更有说服力。

考虑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个多维概念，而且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测量方法，如自陈问卷，文化任务和文化产品(Ren et al., 2016; 黄任之，任孝鹏，黄敏, 2016)。因此，本研究是在控制外地移民后，采用已经在自愿拓疆运动假说研究中使用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测量工具，如 Singelis 的自我构建量表、归因任务、亲亲性任务(Feng et al, 2017; Kitayama et al., 2006; Kitayama et al., 2009)，还有已经在中国被试中得到检验的工具，如 Van de Vliert 使用的集体主义量表(Van de Vliert's collectivism scale)和分类任务(Triad task) (Van de Vliert, Yang, Wang, & Ren, 2013; Talhelm et al., 2014)，以进一步检验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与个体主义的关系，即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已经形成了与对照地区相比更偏向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具体而言，在上述所用到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自陈问卷上，深圳人的个体主义指数高于对照组，而集体主义取向低于对照组；在分类任务上，深圳人的整体性思维低于对照组；在归因任务上，深圳人更偏向素质归因；在"亲亲性"任务上，深圳人的内群体偏好低于对照组。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选取深圳与襄樊(对照地区)两地高校一、二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 66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 583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8.33%。根据 18 岁以前主要居住地与现居住地是否一致判断是否为本地人，其中深圳市样本 270 人，本地人 78 人(27.7%)，外地人 192 人(68.1%)，男生 78 人(28.9%)，女生 190 人(70.4%)，缺失 2 人(0.7%)，平均年龄 19.77 ± 1.30 岁；襄樊样本 313 人，本地人 108 人(34.5%)，外地人 203 人(64.9%)，男生 115 人(37.0%)，女生 190 人(63.0%)，平均年龄为 19.39 ± 2.29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建构量表

采用 Singelis 编制的自我建构量表，共 24 个条目，采用 7 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由独立我和互依我两个分量表组成(段洋，陆柯雯，任孝鹏, 2013)。在本研究中，独立我、互依我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0 和 0.77。采用个体主义指数(即独立我与互依我得分之差)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得分越高说明独立我越高。

2.2.2 集体主义量表

采用 Van de Vliert 等人编制的集体主义量表(Van de Vliert et al., 2013)，共 14 个条目，采用 5 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6，信度良好。采用量表总均分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得分越高说明独立我越低。

2.2.3 图片分类任务

向被试呈现一系列图片，每张图片分别有三个物体(如，鸡、草和牛)，图片的上面是两个物体(鸡，草)，分别标记为 A 和 B，图片下面是一个箭头所指的物体(牛)。被试的任务是选出 A 和 B 物体中哪一个与箭头所指向的物体相配。通过所选出事物的组合，可以测出被试是通过类别还是关系将事物进行联系(Ji, Zhang, & Nisbett, 2004)。选择鸡，说明采用类别将事物进行联系，体现的是分析性思维；选择草，说明采用关系将事物进行联系，体现的是整体性思维。计算整体性思维(即关系分类频次占总选择频次的比例)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比例越大说明被试互依我越强，反之独立我越强(Talhelm et al., 2014)。

2.2.4 归因任务

采用 Kitayama 和 Ishii (2006)编制的社会判断的倾向性偏差问卷。向被试呈现 4 个场景，每个场景中主人公做出某种行为(如制药公司主管向需要帮助的非洲国家捐赠疟疾药品)，然后要求被试判断 2 个问题：a.影响主人公行为的原因更可能是他/她的个人特征(比如她的性格、态度或脾气)还是他/她周围的环境特征(比如氛围、社会规范或其它背景因素)？b.没有做出某种行为更可能的因素是他/她的个人特征还是他/她周围的环境特征？采用素质归因和反事实素质归因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素质归因和反事实素质归因越高说明独立我越强(Kitayama et al., 2006)。

2.2.5 "亲亲性"任务

被试面临 4 个场景，分别是诚实朋友、不诚实朋友、诚实陌生人和不诚实陌生人。在每个场景中，被试都可以根据朋友或陌生人的诚实或不诚实行为选择 0~1000 元的奖励或惩罚(每级相隔 100 元)，但需花费被试所选数额的 10%，如选择

奖励朋友 1000 元, 则需要花费被试 100 元。Wang 等人(2011)、Talhelm 等人(2014)和马欣然等人(2016)的研究分别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验证了“亲亲性”任务的效度。本研究中, 使用对朋友(陌生人)的奖励(惩罚)数值作为独立我/互依我的观测指标, 对朋友(陌生人)的奖励数值越小或惩罚数值越大说明独立我越强。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将研究工具统一装订成册, 研究者使用统一指导语对班级进行集体测试, 当场回收问卷。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 缺失值采用平均数替代。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其中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为 4 个, 第一个因子能解释 21.86%的变异量, 小于 40%的临界标准, 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郑雪, 孙配贞, 2012)。

3.2 自愿移居地区(深圳)和对照地区(襄樊)的个体主义测量指标得分差异比较

深圳与襄樊本地和外地人样本在不同个体主义指标上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所示。以居住地(深圳 vs 襄樊)为组间变量, 是否本地人(本地人 vs 外地人)为控制变量, 分别以个体主义指数、集体主义取向、素质归因、反事实素质归因、整体思维为因变量, 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是否本地人主效应及居住地与是否本地人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其中：(1)个体主义指数($F(1, 577) = 12.74$, $p < 0.001$, $\eta^2 = 0.02$, 95%CI = [0.004, 0.050])、集体主义取向($F(1, 579) = 88.23$, $p < 0.001$, $\eta^2 = 0.13$, 95%CI = [0.085, 0.183])、整体思维($F(1, 550) = 70.64$, $p < 0.001$, $\eta^2 = 0.12$, 95%CI = [0.069, 0.164])的居住地主效应显著, 深圳样本($M = -0.32$, $SD = 0.80$)比襄樊样本($M = -0.58$, $SD = 0.76$)报告了更高的个体主义指数, 深圳样本($M = 3.50$, $SD = 0.49$)比襄樊样本($M = 3.90$, $SD = 0.47$)报告了更低的集体主义取向, 深圳样本($M = 0.65$, $SD = 0.25$)比襄樊样本($M = 0.83$, $SD = 0.20$)报告了更低的整体思维; (2)素质归因和反事实素质归因的居住地主效应不显著, 深圳样本的素质归因($M = 0.70$, $SD = 0.24$)和反事实素质归因($M = 0.61$, $SD = 0.26$)均与襄樊样本的素质归因($M = 0.66$, $SD = 0.26$)和反事实素质归因($M = 0.61$, $SD = 0.29$)无显著差异。

以居住地(深圳 vs 襄樊)为组间变量, 关系类型(朋友 vs 陌生人)和行为(奖励诚实 vs 惩罚欺骗)为组内变量, 是否本地人(本地人 vs 外地人)为控制变量, 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关系类型、行为、居住地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547) = 14.45$, $p < 0.001$, $\eta^2 = 0.03$, 95%CI = [0.006, 0.057]。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奖励诚实而言, 深圳样本对朋友的奖励($M = 697.87$,

表 1　深圳和襄樊本地、外地样本在不同个体主义指标上的描述性统计($M \pm SD$)

测量指标	深圳地区		襄樊地区	
	本地人	外地人	本地人	外地人
个体主义指数	−0.32 ± 0.69	−0.31 ± 0.84	−0.53 ± 0.67	−0.60 ± 0.80
集体主义取向	3.52 ± 0.56	3.50 ± 0.46	3.93 ± 0.43	3.89 ± 0.48
整体性思维	0.65 ± 0.26	0.64 ± 0.24	0.81 ± 0.22	0.84 ± 0.19
素质归因	0.68 ± 0.26	0.71 ± 0.23	0.68 ± 0.27	0.65 ± 0.26
反事实素质归因	0.63 ± 0.28	0.61 ± 0.25	0.62 ± 0.29	0.61 ± 0.29
对朋友的奖励	664.94 ± 315.71	730.81 ± 266.77	781.19 ± 320.22	804.26 ± 276.31
对陌生人的奖励	532.47 ± 324.22	539.46 ± 304.87	545.54 ± 362.36	503.72 ± 347.85
对朋友的惩罚	444.16 ± 353.36	440.54 ± 333.83	357.43 ± 386.87	344.15 ± 371.03
对陌生人的惩罚	457.14 ± 370.78	454.59 ± 329.18	451.49 ± 403.39	410.64 ± 377.29

注：个体主义指数是采用 Singelis 自我构念量表的独立我与互依我的差值; 集体主义取向是采用 Van de Vliert 的集体主义量表; 整体性思维是采用 Ji 等人的分类任务; 素质归因和反事实素质归因是采用 Kitayama 等人的归因任务; 对朋友/陌生人的奖励/惩罚是采用 Wang 等人的“亲亲性”任务。

SD = 283.02)显著低于襄樊样本(*M* = 792.72, *SD* = 292.06)对朋友的奖励, $t(2, 563) = -3.48$, $p = 0.001$, $d = 0.33$; 深圳样本对陌生人的奖励(*M* = 535.96, *SD* = 310.07)与襄樊样本对陌生人的奖励(*M* = 524.63, *SD* = 352.93)无显著差异, $t(2, 570) = 0.65$, $p = 0.52$。对于惩罚欺骗而言, 深圳样本对朋友的惩罚(*M* = 442.35, *SD* = 339.01)显著高于襄樊样本对朋友的惩罚(*M* = 350.79, *SD* = 376.03), $t(2, 555) = 3.00$, $p = 0.003$, $d = 0.24$; 深圳样本对陌生人惩罚(*M* = 455.34, *SD* = 341.21)与襄樊样本对陌生人的惩罚(*M* = 424.91, *SD* = 386.40)无显著差异, $t(2, 565) = 0.94$, $p = 0.35$。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深圳比对照地区更个体主义, 在自我报告的外显信念上, 深圳人比对照组的个体主义更高, 集体主义更低; 在分类任务上, 深圳人更偏向分析性思维, 在亲亲性任务上, 深圳人的内群体偏好更低。这与 Feng 等(2017)和陈姗姗等(2016)的结果一致, 表明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 经过约四十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与对照地区相比更偏向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这也与 Kitayama 等(2006, 2009)以及 Ishii, Kitayama 和 Uchida (2014)的发现一致, 某个边疆地区, 只要经历了大量自愿移民的移居运动, 就会促进或抚育高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 从而证明了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的普遍性, 不仅适用于源文化是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 也适用于源文化是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

另外,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自我选择和适应性可能都在深圳的高个体主义地区文化中发挥了作用。自愿拓疆运动本身既包括了移民和在拓疆地区的活动两个环节, 这也使得导致地区差异的可能机制有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 其中自我选择和适应性是被最多关注的两个。本研究发现深圳的个体主义更高, 而深圳都是由移民者组成, 说明自我选择起作用, 而同样是外地人, 深圳的外地人更像深圳人, 襄樊的外地人更像襄樊人, 说明适应也在起作用。这说明在深圳, 可能最初来的人确实是高个体主义倾向的人偏多, 从而使得该群体的个体主义程度高于对照地区; 但是, 他们来到深圳以后, 可能在艰苦环境中打拼也会进一步促进个体主义的提升。这和以往的研究比较类似, 如 Kitayama 等人(2006)在对北海道的研究中, 选取了北海道出生−北海道长大的日本人、对照地区出生−对照地区长大的日本人、对照地区出生−移居北海道工作和生活的日本人, 通过三者的比较来间接推断自我选择和适应的作用, 结果发现因指标而异, 总的来看自我选择的作用更重要。另外, 自愿拓疆运动与居住流动性等假说不同, 它主要用来解释某个地区的高个体主义文化。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特征使得这种假说的优势在于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能够解释真实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差异, 而劣势则在于地理空间上的比较往往很难辨析究竟是其中哪个环节起作用或者说哪个环节起的作用更大。不过, 深圳与北海道和美国西部拓疆运动不同, 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 其第一代移民仍然健在, 而且现阶段每年还有大量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入深圳, 使得探讨各自的作用仍存在可能。另外, 未来也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 通过启动和情景模拟的方法来检验自我选择或适应性在自愿拓疆运动假说中的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二, 一个是进一步丰富了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运动的证据, 与陈姗姗等(2016)和 Feng 等(2017)的研究相比, 本研究将深圳人分为本地居民(有深圳户口)和外地移民(无深圳户口, 但是在深圳生活), 发现在控制了是否外地人以后, 深圳人仍然比对照组的个体主义要高, 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证据。二是与 Kitayama 等(2006, 2009)的研究相比, 克服了用拓疆者的后裔来替代拓疆者进行比较的缺点, 为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的稳定性, 即使经过上百年的变化后, 自愿拓疆运动导致的高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也仍然存在。

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 一个就是发现深圳和对照样本在归因任务上并没有差异, 与 Kitayama 等人(2009)的结果并不一致。这也提示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是否存在文化任务的特异性。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存在多个面向(Brewer & Chen, 2007;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也就是说深圳与对照地区相比, 是不是在个体主义的某些面向存在差异, 而在个体主义的某些面向则没有差异。如果是这样的话, 未来需要采用更

多文化任务来确定究竟深圳和对照样本在哪些个体主义的面向上存在差异。

本研究的第二个不足是对照组的选择，这里面又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地区作为对照样本是最理想的，目前已经被选择的地区包括省会城市(武汉)和地级城市(襄樊、佛山、巴中和荆州)，但是这些地区与深圳都有可比较的一面，也有不可比较的一面。有人建议如果拿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对照地区结果可能更为理想，因为作为一线城市、在现代化程度比较接近。其实，很难找到完美的对照地区，即使是 Kitayama 等(2006, 2009)和 Ishii 等(2014)的研究也很难说对照地区在别的潜在的混淆变量上已经做到了严格地控制。未来可以同时采集多个地区的样本，这样就能更好地凸显自愿拓疆运动促进个体主义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本研究没有采用来自西方文化的被试作为对照组，这是 Kitayama 等人建议的方法，未来如果能够增加来自西方文化的被试作为对照，而深圳的个体主义的分数能够高于中国其它地区，而且和西方被试没有差异，则提供更强的证据(Kitayama et al., 2006)。尽管有学者指出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拓疆运动地区的人们的个体主义分数与西方文化的被试没有差别并不一定是拓疆运动有效与否的保证，但是未来如果能够增加西方文化的被试作为对照组会提供更多信息和证据。

5　结论

(1)深圳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自愿拓疆地区，已经形成了与对照地区相比更偏向个体主义的地区文化。

(2)自愿移居假说也适用于源文化是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

参考文献

陈姗姗，徐江，任孝鹏. (2016). 独立我的自愿移居假说：中国的证据.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4), 738−740.

陈欣欣，任孝鹏，张胸宽. (印刷中). 深圳精神抚育独立我的行为方式.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段洋，陆柯雯，任孝鹏. (2013). 自我与幸福感：关系和谐、自尊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2), 317−319.

何梅念，郭田友. (2008). 深圳外来工子女社会认同的内隐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2*(12), 917−921.

黄任之，任孝鹏，黄敏. (2016). 个体主义常用的测量方法及评述.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6), 1034−1037.

马欣然，任孝鹏，徐江. (2016). 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南北方差异及其文化动力. *心理科学进展*, *24*(10), 1551−1555.

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 (2012).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5), 757−769.

Brewer, M. B., & Chen, Y.-R. (2007). Where (who) are collectives in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114*(1), 133−151.

Feng, J., Ren, X. P., & Ma, X. R. (2017). Ongoing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independent agency: Evidence from Chin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287.

Ishii, K. (2014). Consequences of voluntary settlement: Normative beliefs related to independence in Hokkaido.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14*(3-4), 159−169.

Ishii, K., Kitayama, S., & Uchida, Y. (2014).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its consequences on predictors of happiness: the influence of initial cultural contex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1311.

Ji, L. J., Zhang, Z. Y., & Nisbett, R. E. (2004). Is it culture or is it language? Examination of language effect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categor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1), 57−65.

Kitayama, S., Ishii, K., Imada, T., Takemura, K., & Ramaswamy, J. (2006).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Evidence from Japan's "northern fronti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3), 369−384.

Kitayama, S., Park, H., Sevincer, A. T., Karasawa, M., & Uskul, A. K. (2009). A cultural task analysis of implicit independence: Comparing North America, Western Europe,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2), 236−255.

Kitayama, S., Varnum, M. E. W., & Sevincer, A. T. (2014). Frontier settle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In A. B. Cohen (Ed.), *Culture reexamined: Broad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influences* (pp. 93−127).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ishi, S., Lun, J., & Sherman, G. D. (2007). Residential mobility, self-concept, and positive affect in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1), 131−141.

Oishi, S., Rothman, A. J., Snyder, M., Su, J., Zehm, K., Hertel, A. W., et al. (2007). The socioecological model of procommunity action: The benefits of residential st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5), 831−844.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3−72.

Ren, X. P., Su, H., Lu, K. W., Dong, X. W., Ouyang, Z. Z., & Talhelm, T. (2016). Culture and unmerited authorship credit: Who wants it and wh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2017.

Sevincer, A. T., Kitayama, S., & Varnum, M. E. W. (2015). Cosmopolitan cities: the fronti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1459.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6184), 603−608.

Varnum, M. E. W., & Kitayama, S. (2011). What's in a name? Popular names are less common on fronti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2), 176−183.

Van de Vliert, E., Yang, H. D., Wang, Y., & Ren, X.-p. (2013). Climato-economic imprints on Chinese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4), 589−605.

Wang, C. S., Leung, A. K.-y., See, Y. H. M., & Gao, X. Y. (2011). The effects of culture and friendship on rewarding honesty and punishing decep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6), 1295−1299.

Ongoing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independent agency: Evidence from several cultural tasks

LUO Cheng[1,2]; REN Xiaopeng[1]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he 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 hypothesis proposed that 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 leads to independent agency. The present work compared 538 college students from Shenzhen (an ongoing 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 region) and Xiangfan. Controlling for resident status, the Singelis self-construal scale, the collectivist orientation scale, the triad task, the attribution task and loyalty/nepotism task were administer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going voluntary settlement and independent agency. As predic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sidents of Shenzhen scored higher in self-reported independent index, lower in self-reported collectivist orientation and holistic thinking, lower in rewarding honest friend and higher in punishing dishonest friend than those from Xiangfa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henzhen as an ongoing 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 is more independent than other regions of Mainland China such as Xiangfan. This implies that even in a generally interdependent culture in East Asia, ongoing 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 leads to independent agency.

Key words: voluntary frontier settlement; independent agency; cultural tasks; Shenzhen